

在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 建构国家话语权

——再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时代意义*

刘 鸿 武

内容提要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知识、思想、学术与观念领域作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国的话语权、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进而为21世纪的人类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思想智慧的必要努力。这一学科建构的意义，应当上升到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理解与把握，并在此境界上去探寻自己的学术路径、理论形态与知识工具。“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3个层面的有机结合，“承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合作实践”3个维度的融汇贯通，或许将为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拓展出敞朗清新的学术境界与精神气度。

关键词 非洲研究 非洲情怀 中国特色 全球视野 非洲学建构

作者简介 刘鸿武，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金华 321004）。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曲折艰难的现代复兴进程，逐渐由“亚洲之中国”转变为“世界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以日益自觉的主体意识努力探寻现代复兴之路，在日见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拓展视野，扩大往来，汲取各国各族之优秀文明成果以丰富完善自我。同时，随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中华文明也逐渐将自己的影响波及遥远的外部世界。应该说，开启于20世纪中期的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对话与合作，正是中国由“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转变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逐渐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引领未来世界发展走向的建设性力量。伴随着这一伟大的进程，今天，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前景，中国国家未来发展的前途，也已经在越来越广阔的领域和复杂的层面上，与包括非洲各国、各民族在内的世界的前途、世界的未来联结在了一起。中国需要与世界一起发展，与世界一起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必须从世界的角度、从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与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为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并对人类未来作出新的贡献，21世纪的中国当以更开阔之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教育部2009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003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非关系全面提升背景下中国如何在非洲与西方国家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合作多赢问题研究”（07XGJ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冲突、影响后果及对策研究”（07JAGJW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之写作受益于王逸舟、秦亚青、朱威烈、梅新林诸位教授倡言与鼓励，谨此致谢。

① 参见刘鸿武：《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5页。

族之文明,努力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对话、交流与合作。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与层面上成为未来世界发展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积极推进者,成为未来世界新秩序与制度的建设性力量。要担当这样的历史责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未来的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知识、思想、学术与观念领域作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以此推进未来世界朝更平等、更和谐、更理想的方向发展。就此来说,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全面加强对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不发达民族发展问题的学术研究与思想创造,正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国的话语权、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并进而为21世纪的人类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产品的必要努力。

非洲研究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全球胸襟

当代中非文明交流开启于20世纪中叶,此后,伴随着中非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中非双方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建构起互利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拓展出面向新世纪的中非合作新模式,而且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旅游观光、新闻资讯等人文领域也建立起多种多样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同非洲国家日见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给中华大地注入了来自遥远世界的异域文明新元素,给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重建带来了遥远世界他者文明的新品质,由此拓展了中华民族更多的想象力、包容性与多样性。今天,随着非洲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与外部关系结构中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非洲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与己无关的他者。来自非洲各国、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木雕、石雕、面具、服饰、咖啡、工艺制品,有关非洲的书籍、电影、音像,正在被当代中国人所认知、消费、欣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前往非洲旅游、观光,也逐渐进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非关系由此而逐渐超出了过往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范畴,开始向更广泛的文明互动与社会交往层面推进。

中非合作关系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依次由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领域,进而拓展到人文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这三大阶段的依次推进与提升,反映出当代中国复兴进程加快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实质性变化,其标示的时代变革意义深远而重要。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开始将其影响波及遥远的热带大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与数十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关系,中华文化在非洲的传播和影响有了明显拓展。在今日非洲,不仅随处可见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国援助的工程,中国经济的影响,而且中医中药、气功杂技、武术太极、针灸按摩、中国餐馆,也已程度不同地存在于非洲各国。即便是在非洲一些遥远偏僻的乡村小镇、部族村寨,都有了某些中国文化的痕迹。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接受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开始,50年间已经有两万多非洲年轻学生来华留学,而这项数字近年正在快速增加。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非洲已出现30多所传授汉语的孔子学院或孔子学堂,还有一些由中国侨民自己开办的可教授汉语的私人国际学校。今天我们去到非洲,在许多地方都可能遇到能说汉语的非洲人,碰到曾经来过中国、在中国学习生活过的非洲人。

这一切,在一个世纪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时,非洲对于中国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的世界。不过,中国现代变革的先驱们,早在百年之前已在眺望未来非洲的发展指向。19世纪中叶,魏源遥望非洲而告诉国人,非洲之“天文历算灵奇瑰杰,乌知异日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此番情怀,足显中华贤哲于世界大势之开阔视野与历史情怀。20世纪初,梁启超在谈到中华与世界之关系时,也曾就中国文明演进之历史形态有一个“三段论”的基本看法。在他看来,中华文明由上古之时迄于秦汉之三千年,为“中国之中国”时期。在此阶段,中国文明之存在,尚限于中华之本土,为自生自长之中华文明。由秦汉及于19世纪中期之两千年,是为“亚洲之中国”时期,在此期间,

中华文明之存在范围已扩展出中华本土，开始将其影响逐渐波及周边之亚洲各地，成为“亚洲之中国”。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则进入向“世界之中国”的大变革时期，中华文明开始向着“世界之中华”的第三期转变。当时，梁启超曾把这一外力推动下的变革称之为中华文明“千古未有之变局”。基于此种对中华与世界关系走向的总体认识，将此古老之中华民族改造为具有世界眼光、对人类命运有所担当的“世界公民”，也成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少年中国”的梦想。^①

百年过去，梁启超的梦想似乎正在一天天地成为现实。事实上，伴随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中华文明在承继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背景下，也正进入了一个面向外部世界而转型重构的新阶段，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逐渐地成为一种“世界性之文明”。这是一个立根于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理性之传统品质而必然要向前推进的过程，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来自非洲的独特文明，对于遥远非洲的认知与了解，在当代中国人的现代世界图景的形构过程中，正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增益作用。我们说，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总体上是在东方世界演进的。国人的思维结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总体上已是自成一统，成规成矩，如空气一般自我不觉却时时框定着国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影响着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近代以后，因西风东渐与欧式文明洗礼，国人多了一个认知世界的维度，国人的世界观与自我认识为之拓宽和改变。但西方帝国如此强势，相形落后了的中国，于救亡图存之中努力认知西方，译西学，以为变法求强之路径。百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可谓成效甚大，这一师法欧美的过程本身也便构成中国文明复兴与和平发展过程之一侧影。不过，在此过程中，太过强势的西方文明几被国人理解为一种世界文明，部分国人更以西式文明为现代文明之同义语，以西式文明之尺度为一切文明之尺度，其结果，是使国人之世界观念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中西二元”维度，向外部世界开放也就几乎成为向西方文明开放。在许多时候，我们所说的“中外文明”已经变成“中西文明”，所谓进行“中外文明比较研究”，其实是进行“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总体上跳不出这种“中西对比”、“不中即西”的二元思维结构与对比框架的束缚。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与遥远非洲现代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在随后年代的不断发展与提升，却让国人看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受到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文化。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与非洲皆处于相对落后边缘之境地，其文化于世界之影响也呈弱势之态，但中非双方自主交往关系的建立，却给了当代中国人另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这一窗口即便尚小，却也透进了不同的景色。寻着这小小窗口，国人得以意识到世界之大，远非中国与西方可包裹全部。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与遥远非洲文明的交往，中国人开始切实地感受到全球范围内那些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中国的人类多样性文明与历史形态的真实存在。通过日益增多的多元文明间的直接交往和由此而来的认知世界的视角变换，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和现代性的认知，终于突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及其偏颇，而开始呈现新的更加多元、更加复杂、也更加均衡的认知取向。事实上，今日之破除“中西二元”史观，与近代早期中华先贤“睁眼看世界”而摒弃夷夏之辨与天朝中心之传统史地观念，进而树立五大洲、四大洋之新世界史地观，在某种意义上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正是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意义所在。

中非合作实践与中华文明的世界化进程

从世界文明的整体结构上看，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是在一个极为广阔疆域

^① 参见梁启超著：《少年中国说》：“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上发展起来的多样性与整体性并存的古老文明，一个由内地汉民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古老大国，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之得以长期存在与持久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始终以一种包容、持中、理性的文明观念，兼容并包地综合汲取国内数十个民族之文化财富与思想智慧。这一优良传统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富于内部凝聚力与外部感召力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关系结构，一种在多元而差异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中维持多民族国家长期存在与持久繁荣的政治智慧与国家传统，这正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一笔珍贵历史财富。^①

在人类走进 21 世纪的今天，这一古老传统依然有其独特之价值与意义。在相互依存之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可以独享繁荣与太平。从根本上说，作为一个疆域辽阔的世界性大国，今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之最终完成，其内在的方面，需以中华民族内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为基础，而其外在的方面，则需要以开阔之胸襟与多维之眼光，在与东西南北之世界多元文明交汇的过程中，锻造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之时代与世界上所有民族共生存的能力与品质。

当代中非文明对话与发展合作的时代意义，自当由此层面上来理解与把握。从世界文明与全球历史的时空结构上看，推进古老的中华文明、原生的非洲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这三大文明体系之交流与结合，实有助于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自我超越和现代复兴提供一个坚实的三角支柱，一个开阔的三维空间。因为这三大文明形态，中华的、西方的、非洲的，各有其独特之历史背景与发展形态，各有其优长之文化魅力与精神品质，它们提供了最具互补性的文化结构与知识形态。这三大文明之交融互动，正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提供更平衡、更全面的精神形态与文化模式，使当代中华文明在复兴与发展过程中，得以在天、地、人的不同层面上，在科学、艺术、自然的不同维度上，实现更好的综合与平衡。^②

然而，是否有此可能，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理性认识和主动选择。因为就世界范围来看，相对于欧洲、中东、印度，相对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与非洲文明相距最遥远、建立文明联系最晚进的。事实上，今天在非洲，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的因素要比中国文明的因素具有更广泛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晚来者，当然也是一个具有特色与优势的晚来者。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东亚文明与遥远热带大陆的非洲文明的相遇与携手，是近代以来人类主要文明相继连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最晚的一对，但也可能是最具潜在意义的一对文明联接。这是因为，站在 21 世纪的起点上向前看，这一东亚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对接、联接与融汇，对未来世界文明整体结构之转换与提升所可能具有的增益作用与积极意义，必将更为明显、开阔与美好。

总体上看，非洲文明在世界史上已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性融合与碰撞。第一次是公元 10 ~ 18 世纪，因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并扩散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开始的非洲文明与外部文明间的内外双向传播过程。在此千年历史过程中，源自中东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及南亚的印度文化，与非洲文明发生了复杂的交融过程，形成了一个跨越西印度洋周边世界、并将东非沿岸纳入其中的“泛印度洋亚非文明圈”。在此期间，在外部世界文化传入非洲的同时，非洲文明也为外部世界特别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和南亚大陆所认知。^③ 16 世纪初，郑和远航抵达东非海岸，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个体系。

第二次非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融合与碰撞则是近代西方殖民入侵后，非洲文明因西方文明传入而发生的更为广泛复杂的变化过程。欧洲的入侵征服作为一种巨大的外加力量，深刻地影响了非洲文明

① 对于中华文明之多样性及中华文明区域结构下汉民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之互动问题的比较研究，是笔者从世界范围思考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交流合作的一个相关性维度，参见刘鸿武：《论民族文化关系结构的独特性与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发展》，载《思想战略》，1996年第2期；刘鸿武等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关于非洲本土知识系统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参见刘鸿武等：《基于本土知识的非洲发展战略选择——非洲本土知识研究论纲（上、下）》，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2期。

③ See Felix Chamji,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Swahili World*,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2, p. 9.

的性质与结构，并将非洲拉入了西方支配与主导的外部世界体系中。^① 在一种被支配、被征服的状态下，非洲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并作为这个极不平等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个边缘性角色，参与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同时也从一种极低的历史起点上艰难地迈出了它向现代社会变革的最初步伐。

事实上，从 19 世纪开始，非洲文明就开始了它的全球传播历程，特别是非洲的艺术、音乐、歌舞早已在西方现代艺术世界里成为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非洲文明的全球化进程要比中国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早。进入当代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获得政治独立而寻求自己的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开始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广大非西方世界的认知与交往，而这或许正是非洲文明对外关系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非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现代交往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随着中国与非洲经济、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中华文明已经日益成为非洲的一道新风景线，非洲文明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非洲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关系及影响，也正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在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沧桑磨难后，非洲文明依然保持着它的个性与活力，依然作为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重要部分丰富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人们怎样地轻视非洲，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将非洲边缘化，但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没有非洲，那这个世界一定会“因失去许多的奇异光彩与生命激情而变得更单调乏味”^②。实际上，离开非洲文明的元素和贡献，现代世界文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非洲各民族的文化，它的那种独特价值、它的那种纯朴自由、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文化个性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是一个目光短浅狭窄而又沉溺于现代都市物欲世界里的人所能理解和认识的，现代人类应该从一个更长远的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去珍惜、保存非洲文明，珍惜、保护非洲文明所赖以生存的热带大陆那壮阔美丽的大自然。

然而，我们对非洲文明能作何种欣赏，我们能否看重非洲文明的精神价值与生存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内心具有怎样的感知力，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具有怎样的包容度。虽然说从西方现代文明的角度上看非洲常常被理解是原始的、落后的、不发达的，但从人类文明的本真意义上看，我们说正是因为非洲文明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知道人类那不加修凿的本真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才得以感受到那让我们心灵自由起来的纯朴生命快乐是什么。非洲艺术的天然品质，非洲音乐的本真美感，都足以冲洗现代物质文明施加在我们心头的铅尘，都足以让我们那被现代都市文明压迫而扭曲的精神生命重新伸展起来。

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路径与取向

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与奋斗，今天，中国的未来已经在越来越广大之领域与世界的前途联结在了一起。为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并对人类未来作出新的贡献，21 世纪的中国当以更开阔之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族之文明，努力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对话与合作。为此，中国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知识、思想、学术与观念领域作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而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正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国的话语权、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并进而为 21 世纪的人类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产品的必要努力。在此过程中，“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3 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承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3 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将为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拓展出某种既秉承传统又融通现代、既有中华个性精神又疏通了人类普遍知识的中华学术新品质、新境界与新气度。

① See B. Lawal ed., *Issue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badan, Nigeria, 1989), p. 11.

② W. Bely, *African Music: A People's Art* (New York: Lawrence Hill, 1975), p. 29.

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的极其复杂性与巨大潜力,当代中非合作关系的特殊实践过程,正为中国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提供了特殊的国际发展空间,为中国实践和检验自己提出的建构和谐世界理念提供了特殊的国际合作平台。事实上,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非洲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商品消费市场等发展要素方面的规模与结构,它在未来可供拓展的发展潜力、增长空间,都会是具有全球性冲击与影响力的。虽然目前非洲总体上比较落后,但这块广阔大陆上那50多个有待发展的国家,那10亿以上的有待解决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问题的人民,其现代发展进程一旦真正启动并走上快车道,其影响与意义将超出非洲自身,而成为21世纪另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人类发展事件,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某种结构性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基于历史的与现实的原因,中国都有可能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而非洲国家对此也有普遍的期待。

从长远来看,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它可以从外部国际环境方面有效延伸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拓展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所必须的外部发展空间,并在复杂变动中的国际格局下继续实施和优化“走出去”战略。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与非洲国家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与非洲数十个国家共同开发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战略资源,开发非洲广袤的土地与巨大的市场潜力,这对于未来20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对于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进程,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

时代环境的变革为中非合作关系跃上历史新高度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与发展条件。作为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50多年来中非合作关系的发展变化往往超出中非关系范畴而产生更广泛的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正在酝酿新的变革,而中非合作关系也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新的发展机遇期,如果把握得当,未来的20年,中非合作关系将跃上一个历史新高度,这不仅对中非双方的发展进程,也会对未来全球国际体系的转换进程,对未来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变革走向,产生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在这个巨大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实践面前,理论本身的探讨与思想已经显得更为重要与紧迫,建构有中国特色之非洲学或非洲研究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学人已经努力担当的责任与使命。

要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离不开长期艰苦之努力,执着之探索,潜心之研究,更需立足非洲实地做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当然,路径之选择及方法与工具之准备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方面,我们认为,“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之3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秉承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3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时代中国之非洲学建构过程中努力追求与开拓的某种学术境界与思想维度,某种努力塑造的治学理念与学术品质。

所谓“非洲情怀”,是想表述这样一种理念,即但凡我们研究非洲文明,认知非洲文化,理解非洲意义,先得要在心中去除了对非洲之偏见与轻视,懂得这块大陆之人民,数千百年来必有不凡之创造,特殊之贡献,必有值得他人尊重之处。我们应该对非洲人民、对非洲的历史文化,怀有一份“敬意”与“温情”,一份“赏爱之情”与“关爱之意”。或许,有了此般非洲情怀,有了此般对非洲情结,方能在非洲研究这一相对冷寂艰苦的领域有所坚持,有所深入,才愿意一次次地前往非洲,深入非洲,作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实地研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去研究非洲,感悟非洲文明的个性与魅力。而所谓的“中国特色”,在于表明,今日中国对非洲之认知,自当站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上,站在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秉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持中之学术传统,以中国独特之视角、立场与眼光,来重新理解、认知非洲文明及当代中非关系。这种立场,一方面需要了解和借鉴外部世界对非洲的相互认知与感受,尊重、借鉴、汲取西方学者过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但也不是简单地跟在西方的后面,如鹦鹉学说他人言语。毕竟,作为中国人,若要懂得非洲文明,也必得对中国文明个性、对中国学术传统也有一份足够的理解与掌握,知彼知己,并有所比较,看出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之何异何同,共性与个性。而所谓“全球视野”,是说在今日之世界,

我们无论是认知非洲文明，还是认知中华文明，自然都不可只限于一隅之所，一孔之见，既不只是西方的视角，也不局限于中国的眼光，而是应有更开阔之全人类之视野，有更多元开放的眼界，在多维互动、多边对话的过程中，寻求人类之共同理想与普遍情感。

更为具体言之，中国的非洲认识和研究，或者说其“中国特色”，可以分为3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服务于并产生于国家和人民之间了解交往的一般知识。如非洲的自然地理、国家与人民、历史与文化、风土与人情及与中华文明的比较等等一般知识；第二个层次是为现实的中非合作与交流服务的关于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等的专门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在“社会科学”一般意义上的非洲学术研究。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的知识属于感性层面，它们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知识的一部分，在此层面上，中国对非洲的认识是全世界对非洲认识的一部分；第二个层次则是时代的和专属的，它针对并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服务于中非合作发展的战略关系，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第三个层次则是纯粹知识和科学层面的，具有最为一般性、学术性、个体性的纯粹知识与思想形态的研究。加强这一部分的研究，正是当代中华文明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获得现代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长远来看，第三个层次的研究是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而从当下看，这一部分之研究也最为不足和薄弱。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在这一层面上，不仅国内研究不足，国际上就更少中国学术界的的声音。加强和深化第三个层面即纯粹学术层面上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实现开放并提升至世界先进水平的需要，也是有效克服百多年来引导同时也束缚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中西二元”思维惯性及相应的“古今中西”狭隘框架的现实途径，是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建立自己的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实现与他人平等对话交流所必须的知识平台。

让人欣慰的是，时代的发展已经为这一中国特色之非洲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今天，中国已有日益完整的对非洲合作的战略、对非洲政策文件，有对非洲合作的“三年规划”、“八项举措”及其落实机制。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特殊意义也开始提升到中非合作关系的国家战略层面来理解。在2009年11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提出未来三年中非合作的八项举措，在第八项中专门提出要加强中非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启动中非研究交流计划，推进中非学者与智库的交流。将学术研究上升到中非合作的战略高度而以国家之力来推进，这是从未有过的，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中非关系的长远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①这个时候，学者的自觉努力与潜心研究，并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与追求学术自身价值之间保持良性、适度之平衡关系，已经显得尤为重要。

“江山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②。当今时代，世界历史进程正进入一个新的大变革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非关系之发展，当代中非文明对话与合作事业的持续推进，必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意义上引导中国学人进行思考，并在更广泛的层面推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世界史学及发展理论与国际合作理论诸学科的变革与创新。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成红）

① See <http://news.163.com/09/1112/17/5NUFF959000120GU.html>

② 杜甫著：《秋兴八首》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ough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Africa: A Study Cas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Ethiopia

Li Zhibiao

PP. 5—11

Nothing is better than presenting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eopl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African people, in strongly fighting back the Western smearing China, provoking dissension in China—Africa relations and the fallacies that China is practicing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circle have bee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ssue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confronted with in Africa in life and property security,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There are universalities between

African countries, but differences are more.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Africa should know well the various conditions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ies and start their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demand of the target countries. It may be the essential way out to solve the issues of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many African countrie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more Chinese companies of strength to invest in Africa and help African countries and people step out of poverty.

The Impa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on Developing China—Africa Trade

Piao Yingji

PP. 12—16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ra, governments have been busy stimulating domestic economy for quick recovery with all kinds of policies of protectionism. Under the current trend, the Sino—African trade is facing a historical moment of brand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ne hand, radical protective measures adop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left the Sino—African trading relation with new space to cover. On the other hand, many African countries are also bending to the wind and resolved to carry out tariff, non-tariff and regional trade barriers to protect domestic industries, this presented a further restriction on Sino—African trade relations.

To Construct Chinese 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o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latform and Ideological High Ground

— A Further Study on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Era of Constructing the Unique “Chinese African studies”

Liu Hongwu

PP. 17—23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make its creative contribution to more areas as the human knowledge, thought and ideologies. To construct the unique “Chinese African studies” is the necessary efforts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seek for its 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express the Chinese nation's notion and policy sense for the future world development and to contribute more valuable wisdom to human being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course of Chinese African studies

at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rom this to seek for our own academic roads, theoretical forms and knowledge instrument. A three-dimensional combination of “African emo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nd global vision” and digestion of “succeeding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borrowing foreign research fruit and summing up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practice”, may develop clear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spirit for Chinese-characterized African study.